真主党大规模袭击 以色列“精准打击”

新华社耶路撒冷 / 贝鲁特25日电 黎巴嫩真主党25日宣布，为报复以色列暗杀该组织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当天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说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挫败了真主党的威胁。

真主党：发射至少320枚火箭弹

在实施报复行动约一个半小时后，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他们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320枚火箭弹。声明还说，真主党针对以色列的第一阶段打击“胜利结束”。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天宣布以全境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新华社记者手机安装的预警系统显示，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阿卡等地及其占领的戈兰高地25日清晨密集拉响防空警报。

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说，阿卡有一人被火箭弹弹片击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对特拉维夫及以北地区的平民防御指南。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部分航班一度取消。

以色列：挫败“迫在眉睫的威胁”

以色列军方25日发表声明说，以军事先侦察到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随即对黎巴嫩境内目标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加兰特同日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挫败了真主党针对以色列“迫在眉睫的威胁”。

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告诉新华社记者，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当天对黎23个城镇实施了35次空袭，其间发射约70枚空对地导弹，以炮兵还向黎19个城镇发射约50枚炮弹。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自25日凌晨开始，以色列对黎实施的一系列空袭，对当地房屋、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电力和供水系统。这是自去年底黎以冲突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行动。

美以防长通话讨论避免局势升级

以军对真主党发动袭击后，加兰特与美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两人“讨论了避免地区局势升级的重要性”。以方称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用一切手段保护以色列公民的安全。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是在发现黎巴嫩真主党计划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才袭击了黎巴嫩，以色列是在“行使自卫权”，“对全面战争不感兴趣”。

25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国防军总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齐·哈莱维（中）指挥军事行动 新华社发（以色列国防部供图）

这是8月25日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拍摄的遭袭建筑 新华社发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一周年 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加害行为

新华社电 8月24日是日本政府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一周年。这一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安全事故频发，引发国内外广泛担忧和质疑。当日傍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东电）停止核污染水排海，批评日本政府将国内海产品遭受“风评被害”（即声誉受影响）的责任转嫁给他国。

抗议集会由日本民间组织发起。在抗议活动现场，民众手持横幅和旗帜，上面写着“不要把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废除核武器”“不要向大海里扔垃圾”等标语，并齐声高呼“不要核垃圾”“不能成为核灾难的加害者”“守护未来”等口号，要求政府停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危害行为。

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强烈反对，正式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到太平洋。据报道，截至目前，日本已进行了8次核污染水排放，一年来总排放量达到约6.3万吨。

这一年间，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人员被核污染水溅射到数吨核污染水泄漏，从多次发生停电事故到不久前核燃料残渣首次尝试取出因人为失误取消……福岛第一核电站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充分暴露东电公司管理混乱和日本政府监督不力。抗议集会发起组织负责人井上年弘表示，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只会加剧民众的不信任感，应该停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行为。

“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我就没有家了。”来自福岛县的抗议者坂口美日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受害者，家中房屋因受到辐射而被拆除，从此失去了家园。她说，福岛县的很多渔民至今仍处于不安和忧虑之中，政府在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的情况下就强制排放核污染水，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

去年10月，东电公司开始向因核污染水排放遭受损失的渔业和水产加工业从业者发放赔偿金。截至今年7月，东电公司共收到约550份赔偿申请，但最终同意赔偿的只有180份。很多行业从业者因无法证明其经济损失与核污染水排海有关而不能获取赔偿，因此苦不堪言。

“星际客机”宇航员明年2月返回地球

改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24日宣布，出于安全考虑，搭乘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两名宇航员，将于明年2月改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星际客机”预计于今年9月初不载人返回地球。

这意味着原计划在太空“出差”8天的这两名宇航员，将要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约8个月。

首次载人试飞的“星际客机”6月5日携美国宇航员巴里·威尔莫尔和苏尼·威廉姆斯升空，6月6日飞抵国际空间站。飞船原定6月14日脱离空间站返回地球，但因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返航时间一再推迟。两名宇航员现已滞留太空两个多月。

按照美航天局公布的最新计划，这两名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工作至明年2月。届时他们将与另外两名预计于今年9月搭乘“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一同返回地球。“龙”飞船定于不早于9月24日发射，搭载的宇航员人数将从最初计划的4人减至两人，以便给两名滞留宇航员留出位置。

美航天局表示，“星际客机”不载人返回能让该机构和波音公司在飞船返回过程中继续收集相关测试数据，同时不让宇航员“承担超过不必要范围的风险”。

美航天局商业载人项目经理史蒂夫·斯蒂克说，让“星际客机”载人返回地球需要更高的确定性。美航天局和波音公司团队已进行大量测试和分析，这些努力有助于为“星际客机”不载人返回做好准备，也有助于未来针对“星际客机”采取纠正措施。

据美航天局介绍，“星际客机”必须在“龙”飞船发射前返回地球，以给后者腾出对接口。预计“星际客机”将在9月初离开国际空间站，安全、受控地自主再入地球大气层并着陆。未来几周该机构会与波音公司协调开展“星际客机”任务结束前的各项工作。

自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天。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4年从美航天局获得载人飞船项目合同，分别建造“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和载人版“龙”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员。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发的“龙”飞船2020年完成首次载人试飞，此后多次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2019年12月，“星际客机”首次不载人试飞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取消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2022年5月，“星际客机”第二次不载人试飞时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按照美航天局要求，为其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的飞船在获得该机构认证前应进行载人试飞，以证明飞船具备定期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能力。美航天局说，待“星际客机”返回后，该机构将审查所有任务相关数据，以告知需采取哪些额外措施以满足其认证要求。

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被捕

据新华社电 社交媒体“电报”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24日晚在法国被捕，原因是涉嫌未能采取措施遏制这一社交平台上的不法行为。消息人士说杜罗夫有望于25日出庭。

多家法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杜罗夫从阿塞拜疆乘坐私人飞机到达法国巴黎附近的布尔歇机场时被捕。

报道说，法国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电报”平台上诈骗、贩毒、有组织犯罪、儿童色情、宣扬恐怖主义等不法行为，杜罗夫被指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遏制这些罪行。法国一家打击针对未成年人暴力活动的机构之前签发对杜罗夫的逮捕令。

一名调查人员告诉法新社记者：“‘电报’不受处罚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杜罗夫出生在俄罗斯，现年39岁，2013年在俄罗斯创建“电报”平台。他2014年离开俄罗斯，2017年移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并将“电报”总部迁至那里，2021年获得法国国籍。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估杜罗夫身家超过150亿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电报”用户增多引起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对这一平台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关注。该社交平台则称从未泄露过用户信息。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杜罗夫被捕消息传出后，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查明杜罗夫相关情况，不过杜罗夫方面尚未请求俄使馆予以帮助。

今日论衡之民生关注 □杨帅

广州公交基础价格优化调整 有利于推动公交服务“提档升级”

据《羊城晚报》报道，8月21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通知，对广州市公交基础票价机制进行了优化调整。根据通知内容，从9月1日起，广州市公共汽车电车日班车线路计价层级由原有的1元、2元、3元、4元、5元五个票价层级简化至2元、3元两个层级，普通乘客和特殊群体的票价优惠政策以及快车、夜班车、BRT等线路票价保持不变。

本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乘坐长距离公交线路的费用将减少。原票价为4元、5元的线路将调整为3元，乘坐公交长距离出行乘客的出行成本将减少。举例来说，小何家住增城区，每天坐214路公交到天河区上班。214路公交线路长度为36.5公里，原线路票价为4元。而根据新方案，单程票价降为3元，按22个工作日、每天乘坐2次公交车计算，小何每月乘坐公交的支出由原来的176元下降为132元，享受普通乘客票价优惠后进一步下降为约121元。此外，20公里以上仅收费3元的价格也比地铁价格要便宜，有利于吸引更多长途乘客选择乘坐公交。

也有市民会质疑，起步价由1元变为2元，那么原来的短途乘客不是会多支付1元吗？其实，这一方面是参考了其他出行方式起步价，如地铁、共享电动车、共享自行车起步价分别为2元、2元、1.5元；另一方面参考了其他主要大城市公交起步价标准，城市公交基础起步价是2元，这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非常普遍，也被人们广泛接受。考虑到公交企业运营的成本，2元仍是远低于成本价的，因此这样的价格也并不为过。

事实上，在2023年，广州市发改委就举行了公交基础票价调整听证会，并公布了票价调整的两个方案，即局部微调（分段收费）方案和单一票制方案，两种方案都提出将公交起步价调整为2元。在听证会上，方案二更是获得了听证的多数代表支持，理由是“定价更为简单、清晰”“长距离更为实惠”“对公交企业运营更有积极作用”等。可以说，这次的价格调整兼顾了公交企业和乘客利益。

近年来，随着地铁线路的增加和城市出行方式选择的增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公交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少地方的公交因为客流量下降导致公交运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出现公交减班次甚至“停运”现象。在此背景下，票价改革和线路、运营模式的调整成为众多公交企业主动破局，适应新的公共交通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今年的广州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就透露，广州将统筹重塑公交线网，实施新一轮公交财政补贴机制并调整公交基础票价等。

从公交行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优化调整公交线网，提升服务质量仍是长远之策。本次广州公交基础票价从五档简化为两档，营运里程20公里（含）以下的公交线路票价统一为2元，将鼓励公交企业多开行更加符合市民需求、贴近社区、衔接地铁的短途公交线路，在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需求的同时，引导公交行业提升服务品质，以吸引更多短途客流。

总而言之，城市公交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便市民出行方面，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交车作为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如何平衡其社会公益性并且提升其运营质量，也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治理智慧。本次广州市公交基础价格的调整，延续了以往公共交通公益性低票价政策，通过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有利于引导和鼓励更多人乘坐公共汽车，推动广州公交行业升级服务，从而让公共交通更普惠更便捷。

善用大数据、鼓励“吹哨人”，守护好医保“救命钱”

首席评论 □朱昌俊

国家医保基金是“救命钱”，属于专款专用的专项资金。可总有不法分子把它当成了所谓的“唐僧肉”，大肆敛财、变相牟利。近日，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医保骗保呈现出新特点。一条由“职业开药人”、药贩子、药店、诊所勾连起来的“回流药”黑色产业链正侵蚀着国家医保基金。

所谓“回流药”黑色产业链，是指有的参保人员通过超量配药、重复配药获取药品后转卖给药贩子，后者再将药品以低买高卖的方式销售给药店、诊所，以获取其中的差价。从相关典型案例看，“回流药”骗保犯罪已呈现职业化倾向：形成“收卡—医保开药—收药—销售给医药机构—购药患者”的闭环。并且，规模已不可小觑：有的单个案例中查处的药品就高达近30吨。其带来的危害性，不仅仅是侵蚀医保基金，而且也给药品安全增加了隐患。如“有的药贩子把真药卖给零散用药的小诊所，然后在真药盒里装上假药卖给药店，以此来以假乱真”。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新型骗保犯罪，当高度警惕。

近年来，相关部门针对骗保行为的打击和治理其实在不断强化。但正如“回流药”黑产的兴起所示，对骗保犯罪的蔓延程度依然不能低估。并且，骗保犯罪的组织化、分工化程度越来越高，团伙化、专业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医保基金安全面临的是一个个越来越专业化的，且手段不断进化的犯罪团伙的挑战，而不仅仅是源自个案式的“钻空子”和“跑冒滴漏”。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有效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在相关监管资源的投入和监管技术的创新上给予更多重视，当是大的前提条件。

应该看到，保障医保基金安全运行，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目前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数量超过了100万，其中又有接近一半属于各类分散的定点零售药店。而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日均结算量约为1800万人次，最高日结算量更是达到了3476万人次。面对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复杂系统，仅靠常规手段，显然很容易留下漏洞。因此，不断创新监管手段当是不可回避的一环。其中，加强大数据监管运用，或是重要选择之一。

事实上，2022年开始，国家医保局就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立了反欺诈数据监测专区，研究开发了“虚假住院”“医保电子凭证套现”等大数据模型，并与公安机关积极推进线索联合查办，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现实看，相关的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近几年骗保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参保人员及其近亲属，职业骗保团伙和一些定点医疗机构，还涉及药品生产企业。这就要求，药品生产企业也有必要纳入医保大数据追溯体系之内。特别是像“回流药”这样的黑产，如果能将药品生产数据和市场流通数据进行联网对比，相信就能更有效地发现“猫腻”。

除了向技术创新要监管效力，创造更好的监督举报条件，也是重要一环。就在近期，国务院安委会明确要求，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而医保领域，涉及的主体众多、环节多，和安全生产其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完全可以更明确地鼓励内部人“吹哨”。调查发现，除了医保用药欺诈骗保，部分定点医疗机构通过挂床住院、过度诊疗、开具虚假检查报告等形式套取国家医保基金，同样堪称“毒瘤”。若能有效激发内部人的举报热情，避免举报者的后顾之忧，这些窃取医保基金的违法操作，当更容易暴露。

维护医保系统安全，遏制各类骗保行为，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但具体应对上，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方向：一、提升监管效力。如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医保体系运行状况的更精准掌握，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局面，自然就有助于压缩骗保空间；二、扩大多元化的监督力量。一个系统的运行越是庞大、复杂，监督力量的配备就越需要立体，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也要有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横向监督。可以说，保障医保系统的安全运行，想方设法扩充监督力量，是绕不开的一步。

（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热点快评

又见“提灯定损” 租房退押金的一般性标准在哪里？ □然玉

8月20日，深圳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自己退房时遭遇“提灯定损”。8月21日，发布视频的网友陈女士向记者介绍，她租住房东的房子期限是一年，租金是每月9000元。8月20日退房时，房东找来专业的验房师打着手电筒一点一点地查验，标注出了七八十处问题。她对此表示不认可并报警处理，但房东拒绝调解，除了拒绝退还18000元押金，还要求她进行补偿。8月22日下午，陈女士再上传一段视频，称在辖区街道办工作人员的调解下，房东答应退回押金。

江西版“提灯定损”，一度激起轩然大波，此事虽有稳妥善后，可与之相关的负面记忆，依旧在不少人的心中挥之不去。的确，“提灯定损”是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概念模型，其大大提高了公众关于“房东刁难，租房纠纷”的叙事效率。于是乎，我们看到，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版本的“提灯定损”案例纷纷曝出，并且无一例外都引发了巨大关注。其中，有些属于是剐蹭热点、生搬硬套，还有一些则确是似曾相识、重蹈覆辙。

租客退租要押金，理所应当。房东收房核验，也属天经地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定损扣押金”的标准在哪里？房屋正常的折旧、耗损、使用痕迹，与破坏、毁伤、损害的界限又在哪里？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捧在手心”呵护的。所谓“租金”，既是对房屋使用权的付费，同样内含了对由使用所带来正常折损的付费。诸如“墙面油漆鼓包、踢脚线松动、插座面板划痕”等问题，要求租客补偿，不仅是胡搅蛮缠、鸡蛋里挑骨头，本身就有“重复收费”之嫌疑。

验房、定损、退押金，整个流程长期以来都没有公认的规范，而更多依靠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自觉、默契以及临场的博弈，其间难免会有极限施压乃至风险外溢的情况。“提灯定损”之类的操作，要的就是先声夺人，争取更多的筹码。对此无理要求，倘若租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去反制，那么其维权成本之高，注定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租房纠纷，特别是“押金纠纷”，很多都属于事实情节清楚、是非对错一目了然，对此职能部门必须用足、用好行政执法手段，在个案中展现出应有的担当。

退租验房，理应“抓大放小”，要着眼于“看大面”“验大伤”，而非揪着细枝末节胡搅蛮缠。在“提灯定损”频发的当下，捍卫租户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具体案例的处理中传递鲜明信号，在实践中确立某种一般性的原则。

高校体育场地开放，做好“平衡”是关键 □陈广江

近段时间以来，围绕大学校园尤其是体育场地设施对公众开放的问题不断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专家认为，目前大部分高校并非财政全额拨款维持运营，以收取适当费用的方式，向社会开放健身场地设施，未尝不是一项有益之举。学者建议，可以引入社会专业团队参与运营管理。（8月24日《工人日报》）

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增强和城市居民对体育设施需求的日益增长，高校体育场地作为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其开放与否、如何开放，不仅关乎民众的健康福祉，也考验着高校的管理智慧与社会责任感。目前看，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开放体育场地已成为社会共识，问题就在于如何开放更合理、更可持续。

近日，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运动场每人次10元的收费引发了网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关于高校体育场地有偿开放的争论由来已久，赞成者和反对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各地大力推动学校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的语境下，有偿开放现象难免引发周边市民不满和舆论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体育场地有偿开放并非无法可依。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学校体育场馆可采取免费、优惠或有偿开放方式，有偿开放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该意见进一步明确，学校可以根据维持设施运营的需要向使用体育设施的开放人群收取必要的费用，收费标准应经当地物价部门核准，并向社会公示。对青少年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原则上实行免费。

有关政策之所以允许多种开放方式并存，不排斥收费，是因为各地各学校情况不同而且差异很大。现实中，不少高校的体育场地面临着供给不足、年久失修、维修资金匮乏等难题，若免费开放，财力、人力难以支撑。采取有偿开放，看似不够“敞亮”，但实际上是在教育资源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种选择虽不够完美，却是解决当前供需矛盾的一种“次优选择”。据报道，今年暑假以来，不少高校都扩大了健身场地的对外开放，而且普遍以收费居多。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有偿开放能够促使使用者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资源，高校也能筹集到一定的资金用于体育设施的维护与改善。同时，有偿开放带来的“限流”效应，也有助于降低安全隐患和管理风险。

从现实情况看，有偿开放模式虽不成熟，但仍不失为一种务实之举。在我国高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仅为三成左右的情况下，若一味盯着“收费”不放，制造舆论压力，难免会影响一些高校开放体育场地的积极性、主动性。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2.89平方米，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依旧突出。因此，当务之急是呼吁、推动更多高校开放体育场地，而不是一味纠结于“收费”问题。只要收费合理适度，有偿开放就不是洪水猛兽。

总之，高校体育场地的开放也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其核心在于如何在多种因素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在确保教学秩序的同时尽可能满足周边市民健身需求，实现高校体育场地综合效益最大化。